

文明交融

灌溉诗歌之花

施越

自古以来,中亚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融通的桥梁。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曾在演讲中引用著名诗人纳沃伊的名句:“没有比生活在友谊之中更美好的事情”“但愿我们的人民生活得幸福富有”,表达对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真诚善良和热情好客的感受,以及中乌两国人民共同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

500多年前,诗人纳沃伊以察合台语和波斯语糅合亚欧大陆多地的文化元素,创作了流芳百世的诗篇。

1441年,纳沃伊诞生于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部城市)。在纳沃伊出生和成长的时代,赫拉特是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15世纪初,帖木儿的第四个儿子沙哈鲁以赫拉特为都城,治国近40年。沙哈鲁重视文化艺术,延揽了一批文人学者和工匠,并修建赫拉特图书馆,收藏制作精美的插图书籍。他的长子兀鲁伯被委任主政撒马尔罕。兀鲁伯本人在天文学领域有较高造诣,于15世纪20年代在撒马尔罕修建天文台,他所编制的天文表在17世纪时传入欧洲,推动了近代欧洲天文学的发展。

纳沃伊诞生并成长在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通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往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沙哈鲁治下的中亚地区在明代史料中被称为“哈烈国”。以陈诚和火者·盖耶素丁为代表的双方使臣跨越山川,互赠马匹、丝绸、瓷器等礼物,并留下了对沿途气候、地理、物产和风俗的详尽记载。在明朝使节的笔下,撒马尔罕“地势宽广,山川秀丽,土地膏腴”,赫拉特“多植果树,自国主而次,有力之家,广筑果园,盛种桃、杏、梨、李、花红、葡萄、胡桃、石榴之类”。

纳沃伊的祖父为帖木儿王朝的贵族,父亲是沙哈鲁麾下的高级军官,母亲是宫廷教师,两个叔叔分别是诗人和书法家。因此,他自幼身处赫拉特宫廷文人所创造的古典文艺氛围中,12岁开始写诗,17岁便在诗坛崭露头角。1447年沙哈鲁去世后,纳沃伊辗转至马什哈德和撒马尔罕继续学业。1469年,帖木儿后裔苏丹忽辛·拜哈拉作为苏丹的幼弟,在苏丹的授意下,统领军队在波斯、印度洋和北非之后返回欧洲,集合法兰克、罗马、沙姆和罗斯的力量,建造铜墙铁壁抵抗来自北方的雅朱斯(即中亚和西亚神话中入侵人间的野蛮部落)。《五卷诗》不仅寄托了纳沃伊对个人道德、社会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同时也生动勾勒出15世纪后半期中亚知识界对历史和地理的认知。

纳沃伊的诗作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影响深远。后世缔造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在回忆录中多次向纳沃伊致敬。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鼎盛时期的君主苏莱曼大帝将《精义宝库》和《五卷诗》珍藏于宫廷图书馆。16世纪的阿塞拜疆诗人费祖里、18世纪的土库曼诗人马赫图姆库里,以及19世纪的哈萨克诗人阿拜均在自己的诗作中提及纳沃伊对自己的影响。1863年造访中亚南部的匈牙利旅行者范里发现,几乎每个当地人都知道纳沃伊。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视纳沃伊为现代乌兹别克语言文学的奠基人,并将众多地点和机构冠以其名: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图书馆、塔什干国立语言文学大学、芭蕾舞剧院(见下图)、地铁站、国际机场和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均在此列。1991年,纳沃伊诞辰550周年之际,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诸多活动,以纪念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鼓励民众学习、传承其诗作中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交流精神。

除了为官方政绩,纳沃伊为人铭记的还有他的文学成就。他不仅延续了波斯文学代表人物菲尔多西、内扎米等人开启的波斯诗歌传统,还在吸收东西方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开创了察合台语文学传统。纳沃伊在30年间创作了约30部作品,其中广为流传的是4.6万行的《精义宝库》四卷诗集和5.2万行的《五卷诗》。其中,创作于1483年至1485年间的《五卷诗》是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五卷诗》在形式上遵循由12世纪波斯诗人内扎米开创的“海米塞”文体,以察合台语写就。“海米塞”一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数字“5”。这一文体包括对题材、情节、格律和创新性等方面的要求。因此,对于12世纪以降的中亚和西亚地区诗人而言,“海米塞”相当于



领域的空白,那么走出国门开展东方视角下的丝路研究,则改变了过去西方视角下的丝路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为复原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 and 科学依据。

谱写合作新曲

多年来,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立民族大学和铁尔梅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哈萨诺夫·穆塔利弗,是我第一次赴乌就认识的老朋友。经过10多年的合作与朝夕相处,尽管在语言上还有障碍,但我们在思想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可以说,中乌联合考古队能在学术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与乌方学者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

相互尊重是联合考古队建立互信的基础。我们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我们曾经历过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我国进行掠夺式考古的历史,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遭遇,留下了许多令人痛心的记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境外开展联合考古工作时,绝不重蹈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的覆辙,在联合考古工作中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不仅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而且必须要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例如,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考古发掘现场,我们在撒拉干遗址一座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性展示大棚。这种做法在当地获得了广泛好评。

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展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金银器、铜器、铁器、玻璃、玉石、玛瑙等80组(件)于撒拉干遗址和拉巴特遗址发掘的文物首次展出,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续写了中乌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为进一步扩展考古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同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术机构,在已有双边合作研究机制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了费尔干纳盆地考古中、乌、塔、吉四国交流合作机制,开创了中亚地区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此外,我们坚持多学科、多单位合作的工作方式,国内外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学生都参加了联合考古工作。这既为乌国培养了一批从事丝路考古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为乌兹别克斯坦培养了青年一代学者。

今年,中乌联合考古工作再次启动。8月,我率领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代表团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与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交流。乌文化遗产署第一副局长图尔苏纳利·库齐耶夫对我说,他希望中方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方面向乌方提供帮助。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国本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和遗址考古的理念和实践,值得与乌方分享,这会成为未来中乌联合考古工作的新方向。多年联合考古工作令我感受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以文化遗产为载体,通过联合考古实现了中乌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了中乌两国民心相通,为双方的深厚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乌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西北大学教授)

“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世界上首个以联合申报的形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在天山区域开展联合科考、生态环境保护等项目合作,中国学界还出版了收录近7000种天山地区植物物种的《天山维管植物名录》。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落实,天山南北曾经交通不便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中吉乌公路联通了星罗棋布于崇山峻岭间的中亚村镇;由中国企业修建的伊塞克湖等景点公路开通后,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自古以来,天山一直是不同地貌环境、不同生物物种和不同民族共同的家园,“和谐”“交融”是它最贴切的形容词。如今,天山依然是联系中国和和中亚国家友好的纽带,曾回响于天山南北的驼铃声与马蹄声伴随今日的火车轰鸣与汽车鸣笛,如交响一般,奏出富饶与安宁的动人音符。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f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

复原丝路历史

自古以来,中亚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之地,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古代人群的迁移、商旅贸易和货品转运,使这里成为国际考古的热点地区。2014年,我们在撒马尔罕遇到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毛里齐奥·托西,他率领的意大利考古团队已在撒马尔罕盆地进行了15年的考古工作。刚见面时,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已经没有必要。然而,当得知我们在他们工作多年的区域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后,他的态度立刻发生转变,要与我们商谈合作事宜。

在我们发掘拉巴特墓地时,一位日本学者拿着他们从一座古城遗址发掘的陶器图问我:“你们发掘的陶器与我们发现的陶器一样,为什么说你们挖的是月氏的,我们挖的是贵霜的?”通过多年对古代农牧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由于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原料来源等原因,古代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和普遍制作陶器,他们使用的陶器来自农业人群的作坊是很常见的,不能因为陶器一样就认为他们是同一文化、同一人群。这也提示我们,在找到月氏遗存后,需要进一步厘清古代月氏与稍晚的贵霜帝国之间的关系。

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贵霜、康居和粟特之间的关系随之成为我们新的课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和进展。2018年至2019年,通过系统区域调查和勘探,我们在苏尔汉河东岸的乌尊市



图①:拉巴特村出土的金带饰。  
图②:谢尔哈拉卡特村出土的文物。  
图③:拉巴特村出土的斯芬克斯形吊坠。  
图片均由王建新提供

谢尔哈拉卡特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墓地,清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25座。这批同时期的墓葬形制和埋葬方式多样,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二者应属两类同时并存的、不同人群的文化。我们的发掘工作吸引了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多国考古学家前来参观,他们均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表示惊讶和钦佩。目前,中乌联合考古队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系统的证据链条,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及突破性观点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如果说,此前我带领团队在中国境内进行丝路考古,填补了我国丝路考古

联合考古谱写中乌友好新篇章

王建新



理了94座小型墓葬。从拉巴特墓地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来看,这类文化遗存在本地区找不到来源,却与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的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从其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看,应是西迁中亚后的古代月氏留下的文化遗存。至此,中乌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知悉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在全球视野下深入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交往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佐证。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是古代中亚文明的核心之地。回顾历史,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表明,早在青铜时代,来自中国的小米就已经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在位于苏尔汉河州帕利特佩为代表的若干遗址中被发现。

公元前2世纪中叶,游牧人群月氏经伊犁河、楚河流域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阿姆河流域。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寻找月氏人。约公元前138年,张骞出发后不久就滞留匈奴,在当地生活了10多年后,才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到达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巴克特里亚),找到了月氏人。这些都是《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历史,那么,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都没有定论。从2000年起,我率领西北大学考古团队沿着张骞的足迹,踏上了寻找古代月氏文化遗存之路。

追寻古代月氏

从2000年起的10年间,考古队在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最终确认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以新疆东天山地区为中心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是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遗存。然而,要使这一发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只有找到西迁中亚后的月氏文化遗存,通过系统比较研究后,方能实现两者互证。

为此,我们从东天山地区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2009年,我第一次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考察。2011年,西北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联合考察队,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开全面考察。2013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组建了中乌联合考古队。

针对古代游牧族群的考古调研,我们摸索总结出一套“游牧聚落考古”的理论和方法,打破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并逐步探索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我们踏遍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克服语言障碍,逐步了解并掌握了各时期、各类型文化遗存的特征、分布现状和分布规律。同时,针对以往考古研究的空白、缺陷和错误观点,中乌联合考古队开展了科学精准的小规模考古发掘。

在新疆和中亚地区,我们新发现了大量古代游牧聚落遗址,从而使我们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践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2015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位于撒马尔罕市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拉干遗址,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张骞经康居抵达月氏的历史相呼应。这一发现令人兴奋不已:找到了康居的遗存,就离找到月氏文化遗存不远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在西天山南麓的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一处古代墓地因当地居民取土建房而被暴露。我们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

明月出天山 丝路沐春风

谢亚宏

旅人心语

从中亚归来数载,时常梦回阿拉木图驻地窗外的塔尔加尔峰:它陪伴笔者迎来清晨晓霞,度过春秋冬夏;它“苍茫云海间”的壮阔激荡了工作一天的劳累,“造化钟神秀”的瑰丽则送来无尽才思。塔尔加尔峰和它所在的外伊犁阿拉套山脉为阿拉木图带来灵气,使之成为笔者心中最美的中亚城市。

塔尔加尔峰和中亚国家众多的巍峨雪山,是来自天山的馈赠。天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全长约2500公里。

持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栖息着雪豹、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仅在西部天山发现的植物种类就超过3400种,约占所有中亚国家山地植物种类的一半,其中许多为当地所独有。这里是多种水果作物的发源地,有着多样的森林类型和独特的植物群落体系,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地位。

天山是坐拥众多资源的“金山”。除了丰富的地下矿藏,作为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中最大的山系,天山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丰沛水源;中亚的三条大河——锡尔河、楚河和伊犁河都发源于此,滋养着众多农田和牧场。天山境内条件优越的天然滑雪场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其中以距离阿拉木图市中心不到半小时车程的珠布拉克滑雪场最为知名。近年来,阿拉木图利用背靠天山的优势举办了众多冬季体育赛事,为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生机与活力。

天山拥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早在史前时代,这里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至今保存有岩画、石人雕像等众多遗迹。2000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天山南北成为商旅不绝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塔什干等许多天山沿线城市的兴

起均肇始于此。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穿越天山,时至今日阅读《大唐西域记》,于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旅途的艰辛:“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凌犯。”劫后余生到达大清池(伊塞克湖)后,玄奘的笔触依然冷峻:“四面负山,众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洑汗,惊波洄流。”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学家的考证,这可能是世界上有关伊塞克湖的最早记载。

伊塞克湖在唐代也被称为“热海”,“热”正是“伊塞克”在吉尔吉斯语中的含义,也是这片湖水的特点。边塞诗人岑参在《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中对伊塞克湖有过神来之笔:“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照汉月。”值得一提的是,岑参并未来过这里,却结合生活经验将伊塞克湖的风光描绘得活灵活现。

今天,天山作为跨境山系,继续承载着中国和中亚人民的深情厚谊。2014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